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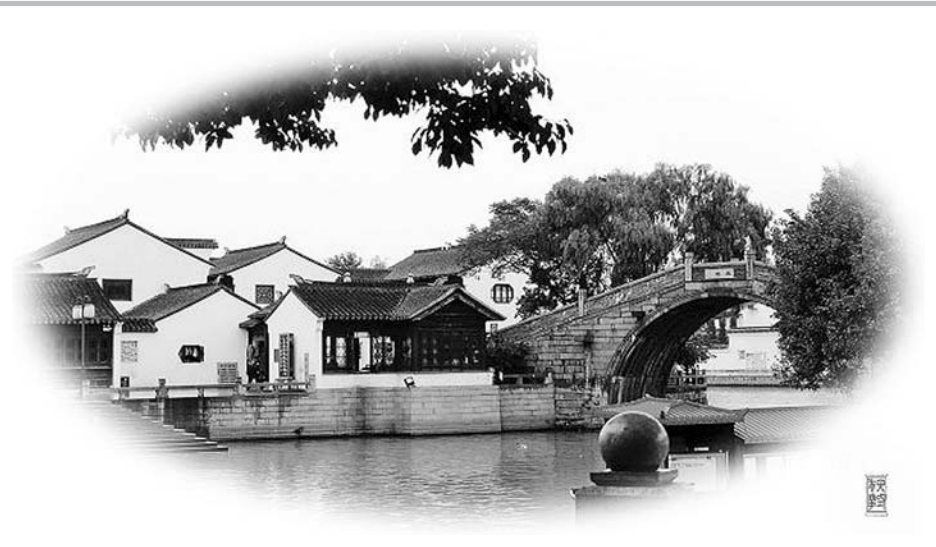
评价运河功与过

唐宋诗歌对运河开凿与运行功过很早就给予了关注。运河开凿的主要决策者是隋炀帝。作为一个曾既强盛,统一又很短命的王朝,隋朝的灭亡与隋炀帝开凿运河有很大关系。因此,反思运河开凿的历史,就不能不联系到隋炀帝。最早出现的这类诗歌作品是白居易的《隋堤柳》。在这首作品中,白居易对隋炀帝开凿运河持彻底否定态度。他认为,正是因为隋炀帝开凿汴河(运河)而用之“南幸江都恣佚游”,才使得“海内财力此时竭”,最终“上荒下困弊不久”,导致个人身丧江都(扬州)、隋朝亡国的结局。在白居易同时及前后,写这类题材的诗人逐渐增多,出现了张祜的《隋堤怀古》、李商隐的《隋宫》、胡曾的《汴水》、罗隐的《汴河》等代表作,这些作品对隋炀帝的开河都持否定态度。
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运河的开通对南北经济及文化的交流,对全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维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,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出行带来巨大的便利。至晚唐,开始有了一分为二的认识与评价。代表作品是皮日休的《汴河怀古》:“尽道隋亡为此河,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,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诗歌认为,如果没有“水殿龙舟”的荒唐与奢靡,单就开凿运河而言,隋炀帝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。这实际上是指出,运河开凿不为过,荒唐嬉游才是过。

随着对运河开凿的认识与评价越来越一分为二,在思考这个问题时,人们也就愈来愈能辩证地看待。于是,晚唐还出现了一首更为别致的讨论运河开通功过的诗歌作品,即李敬方的《汴河直进船》:“汴水通淮利最多,生人为害亦相和。东南四十三州地,取尽脂膏是此河。”作品认为,运河通航对朝廷是利,对百姓却是害,因为东南地区的“民脂民膏”都是通过这条河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朝廷的。这种对运河功过利弊的分析更进了一层,也更加全面。

北宋时,运河的作用比唐代更为重要,它是南粮北运的最主要水道。在谈到运河时,宋代诗人就不再只是着眼于写运河本身的功与过,而是完全着眼于现实,就北宋运河的畅通及治理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。这些诗篇中有的主张停罢漕运,如石介的《汴渠》;有的主张不能罢漕运,但朝廷要节俭开支,如梅尧臣的《汴渠》;有的主张另外疏凿秦汉时期通往关中的旧渠,如郑獬的《汴河曲》。



隋炀帝下令修建贯穿南北的“大运河”,是唐宋时期连接经济中心(江南地区)与政治中心(北方洛阳、开封),并进一步辐射到整个中国的交通大动脉。而这一时期,又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诗词创作的繁荣时期,因此,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中,必然会出现为数不少的反映、描写运河的作品,也必然会有受到运河开凿与通航影响的文学现象的发生。



唐宋诗词与大运河

□苗菁

运河上演离别情愁

大运河和唐宋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,人们的仕宦、游历都离不开这条水系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运河是唐宋人的一条生命之河,在其上不断展示着唐宋人为生计,为前程,为理想而奔波、奋斗的心理脉动,也不断上演着他们送亲别友的离别图像。

这是条能牵动思乡之愁的河流。如崔颢《晚入汴水》:“昨晚南行楚,今朝北汴河。客愁能几日?乡路渐无多。晴景摆津树,春风起棹歌。长淮亦已尽,宁复畏潮波。”作为开封人的崔颢,一进入运河,离家乡愈近,人的情绪也就愉悦起来,连景色都让人感觉到惬意。这是条引发客愁的河流。如欧阳修的《自河北贬滁州初入汴闻雁》:“阳城淀里新来雁,趁伴南飞逐越船。野岸柳黄霜正白,五更惊破客愁眠。”

这是条能给人以精神追求的河流。如孟云卿的《汴河阻风》:“清晨自云牛马形,梁宋挂席之楚荆。出浦风渐恶,傍滩舟欲横。大河喷东注,群动皆曾冥。白雾鱼龙气,苍茫迷所适,危安惧暂宁。信此天地内,孰为身命轻。丈夫苟未达,所向须存诚。前路舍舟去,东南仍晓晴。”面对着这滔滔流水,有人会有惆怅与失

意,但也有人会如孟云卿那样,虽已有多次的不如意,但仍能坚定信心,矢志不渝地追求下去。在孟云卿看来,人生和自然界一样,有阴就有晴,狂风过后将是风平浪静的美好前程。

这也是条不断消逝、消磨人生命的河流。如王安石的《汴水》:“汴水无情日夜流,不肯为我少淹留。相逢故人昨夜去,不知今日到何州。州州人物不相似,处处蝉鸣令客愁。可怜南北意不就,二十起家今白头。”数百年来,这条河上有无法计数的人走过,其中许多人应是多次往返。无论是中唐的白居易,晚唐的杜牧,还是宋代的王安石,他们的感觉是相通的。

这更是一条送别的河流。在这条河上,唐代就曾上演过无数次送亲别友的剧目,也留下大量写离别之情的作品。北宋时期,以许多送别与离别都是发生在开封城外或沿途的运河(主要是汴河)上。如柳永那首著名的离别词《雨霖铃》,词中所写的送别地点是在汴京都门外的汴河畔,其“执手相看泪眼”的送别场合是在汴河上,其“念去去”而登舟远行的路程是延伸向漫漫“楚天”的汴河水。

地名成文化符号

因开河而形成的运河水系

中的一些河名、地名及相关景点成了唐宋人在创作诗词时常用的文化符号。特别是隋堤、汴水,成了唐宋诗词中经常提到和描写到的景象或意象。在宋代,“隋堤”不仅是代称隋朝遗迹,最能代表隋朝特征的文化符号之一,成为评论隋炀帝功过是非的一个聚焦点,“隋堤柳”也不仅仅是一种亡国的象征,更成了人们心目中能展示汴京繁盛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进而,“隋柳”、“隋堤柳”、“隋堤絮”在唐宋人那里,逐渐成了泛指“柳树”与“柳絮”的代名词。

汴水(汴河)更是诗词中经常使用的景象。写到运河沿岸的城市,汴水(汴河)往往成了诗人描写该地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;描写和这些城市有关的历史遗迹或人物事件时,汴水(汴河)也多成了重要的抒情元素;写到沿运河南归与北上的情景时,汴水(汴河)也成了人们必然要提到的景象。到了南宋,汴水(汴河)更成了沦陷金人之手的汴京故都的象征,如朱敦儒的《浪淘沙》:“北客相逢弹泪坐,合恨分愁。无酒可销忧。但说皇州。天家宫阙酒家楼。今夜只应清汴水,呜咽东流。”在朱敦儒的心中,东流不尽的汴水是他对故都最难忘怀的典型景象。

我于1967年在临沂卫校毕业后,分配到沂南县砖埠公社医院工作。自此,我在这个乡镇医院度过了9个春秋。

砖埠医院坐落在岭顶之上,四周是一片农田,西侧是一条小溪。在这里,春天到处是绿油油的麦苗;夏天可以看到一块块苞米方阵,碧绿的叶子和绿中微红的

【口述城事】

难忘的砖埠医院

□卢中华

苞米须丝在风中抖动;而在秋收季节,随时可见刨地瓜和花生的村民。砖埠虽是个小地方,但也有人杰地灵。这里曾是古代的阳都故城,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诸葛亮的故里,也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祖居地。就砖埠医院来说,是沂南县分院,在周围也颇有名气。医院里有个苏老先生,他的中医医术远近闻名。还有个孙兰修女外科医生,年轻时曾跟随德国修女学医,人称“洋姑娘”。抗日战争时期,她曾冒着枪林弹雨到前沼泽地抢救八路军伤员,经她救治的八路军伤员达120多人。孙兰修医生终生未嫁,但医术高明,擅治疮疡肿疔,求她治病的人络绎不绝,被誉为“沂蒙山区的林巧稚”。后来,院里还分来几位大学生,可谓人才济济。

我分配到砖埠医院时,正处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当时医院分工不细,工作不够固定。我学的是护理专业,根据医院需要我干过司药、收款及小手术室、注射室的工作。同我一起分到医院的有7个学生,来自青岛、济南、莱阳、临沂等医校。那时,我们刚刚走出校门,上班时工作热情高涨,闲暇时间分外热闹。我们一起学唱样板戏《沙家浜》,一起说宣传计划生育的“三句半”,有时还到附近的中学去打篮球,生活可谓丰富多彩。

刚到砖埠医院,就有人给我介绍对象。也许因为我从小受到沂蒙精神的熏陶,对解放军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在砖埠医院工作期间,县里征兵时常抽我去帮助体检。能为部队工作,我感到很高兴。在我的心目中,军人总是和保卫祖国连在一起,因而喜欢军人,也喜欢那绿色的军营。那时,同事刘福英的爱人在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工作,正巧家里给我介绍的对象在警卫第2师的团里当参谋。这在冥冥之中,似乎注定我也要嫁给军人。然而在那个年代,军人似乎并不怎么吃香,据说军官也得复员回家。尽管在这种情况下,我还是毅然接受了这门亲事。

1972年我怀孕时,院里派我到沂水中心医院学习针灸麻醉1年,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经历了“十月怀胎”的艰辛。临近生孩子时,我很想爱人能回家陪我一段时间,但他那时正在首都机场执行尼克松、田中访华的有关警卫任务,直到孩子出生也未能回家,是母亲和妹妹陪我度过了那段困难时光。当时在砖埠医院工作很忙。因为不分班,什么时间有病号就什么时候干,因而孩子喂奶就成了问题。有时一忙起来,孩子半天吃不上奶。每当遇到这种情况,母亲就有些着急,常说:“人家谁不上班,上班就不管孩子了吗?”

岁月流逝,往事如烟,但“砖埠”二字始终萦绕心中。现在想来,砖埠医院之所以令我难忘,不仅因为那里有感情真挚的同事,周围有淳朴的乡亲,它是我工作和走向社会的起点,还在于我在那里收获了爱情,建立了家庭,也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。对我来说,砖埠就是我的第二故乡。

【忆海拾珠】

黄纲存：驾机回归大陆的台湾空军少校

□周冰

1919年,黄纲存出生在夏津县城西郊保屯。1937年黄纲存替其多病的三叔应征入伍,被编入国民党某部工兵二团一营三连,任上等传达兵,从此踏上军旅生涯。在军中他报考飞行员,从3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,靠自学考入空军航空学校。从1944年起,先后去印度、美国学习飞行技术,两年后毕业回国。

黄纲存的大哥在八路军医院工作,受其影响,他平日里流露出一些不满内战的情绪,因此被调离空军作战部队,到杭州笕桥航空飞行学校担任飞行教官。

1949年,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,黄纲存与妻儿随空军撤至台湾。在台湾,黄纲存凭借自己出色的工作,成为台湾空军军官学校里一名飞行教官,生活条件也很优越。然而,他依旧十分关注家乡,牵挂大陆。有一次,他悄悄地在广播中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发出的“革命不分先后,欢迎回家建设祖国”的号召,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开始寻找机会返回大陆。

1956年8月15日一大早,他来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,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冲破严密的控制,先后有40多架各种类型的飞机、100多次驾机或随机起义归来,黄纲存即其中一员。1956年,时任台湾空军少校飞行教官的黄纲存怀着满腔热血,毅然驾机从台湾飞回祖国大陆。

到台湾岗山机场带学员进行试飞训练。这时,一位学员说机舱出现故障,飞机不能正常起飞。黄纲存检查了一下飞机,并要求地面机械师给飞机加满油,要到空中试飞。当时他的学员也要求一起上机试飞,他巧妙地拒绝了学员的要求。当他踏上飞机的那一刻,他意识到机会来了,感到了一股归心似箭的冲动。他来不及多想,驾驶着那架美制AT—6型高级教练机,越过海峡向着大



陆的方向飞去。一个小时后,飞机稳稳地迫降在福建省某地。人们看到美国的飞机降落下来,开始一阵骚动,以为是国民党开始空袭。当黄纲存说明自己是从台湾飞过来,是驾机起义,是飞回来报效祖国的,人们顿时一片欢腾。他也成了祖国解放后又一个从台湾驾机归来的飞行员。

黄纲存从台湾驾机起义的消息,很快传到了首都北京,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位青年才俊的归来

十分欣喜,专门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,首都各界代表900多人参加。周恩来总理亲切地接见了,邓颖超亲自为他拍照留念。听说黄纲存回来了,远在夏津县家乡的老父亲和弟弟也专程赶到北京看他。时隔多年后父子再次相见,两人抱头痛哭。黄纲存把美国人的飞机开了回来,这一消息振奋人心。国家奖励给他黄金,他却拒绝了,只收下了8000元的安家费。在他眼中,能够受到这样高规格的礼遇,是他没有想到的。

黄纲存回到大陆,恰逢四川空军十四航空学校组建。组织上考虑到他的特长,把他分到了那里任副团长,负责培训新学员,为他们传授国外的飞行新技术。

1978年,黄纲存调回山东任山东民航局副局长。198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黄纲存还有一个心愿,就是台湾回归祖国。虽然他驾机从台湾归来,但他一直在等待和自己台湾家人重逢的时刻。然而,1986年正月初三,他突发心肌梗塞,经抢救无效,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。